

中西方和谐理论辨源及对话

高伟华

(沈阳化工大学外语系, 辽宁沈阳, 110142)

摘要: 和谐理念在中西方文化中占据极大的版图和言说力度。和谐思想在西方可以上溯到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为区别的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两大学派, 在中国可以上溯到以出世和入世为区别的道家老子和儒家孔子两大门派。西方和谐论历经古希腊、中世纪、十七、十八世纪和近现代的发展, 不断地在批判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中国的和谐论历经先秦、汉唐、宋元和明清的发展,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两条清晰的发展脉络, 使中西方和谐理论多元的平等对话具有了可能。和谐理论在中西方的发生在于两者具有相似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精神世界传统——神话。然而, 就发生的和谐理论而言, 中西方也在相似的基础上有着重大的不同。存在的不同使中西方的和谐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 存在的相似中西方的和谐最终趋向同一。近现代以来, 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断, 这种文化上的融合促使了和谐理念呈现出崭新的内涵, 使之成为一种为中西方共有的观察世界、分析世界的强大方法论工具和美学理念。

关键词: 中西方 和谐理论 唯心与唯物 出世与入世 对话

中图分类号: B83-02

文献标识码: A

和谐是中西方文化的精神特质, 是人类对和平和自由的永恒追求。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交互发展中, 和谐因素维系着两者的动态平衡, 是科学之真、道德之善、艺术之美, 具有最高最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没有和谐就没有这个美好的世界。“和谐”一词在中西方存在已久, 在中国, 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记载, 应该是《周礼·春官宗伯第三》: “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①这些是“和谐”二字的早期由来。因而从原始含义上来讲, 中国的“和谐”是与祭祀音乐的感动心灵的节奏分不开的, 具有强烈的教化的社会功能。和谐对应的英文为“harmony”, 词源为希腊神话中代表和谐和协调的女神哈耳摩尼亚(Harmonia)的名字, 这位女神是战神阿瑞斯和爱神阿芙洛狄忒私通所生的女儿, 底比斯国的开国女祖。由于其夫曾杀死战神圣蛇而犯下罪行, 底比斯国战火不断, 为了后世子孙的安宁, 最终与其夫一起幻化为蛇, 隐居于森林之中。因而在西方, 和谐往往伴有一丝不幸的意味。到了中世纪, 该词传入法国, 词形演化为 armonie, 进而传入英国, 演化为 armony。随后, 演化为现在熟悉的 harmony。该词的和谐词义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并被纳入到美学的研究体系之中, 成为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可以说, “和谐”一词在中西方自诞生之日起, 便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含义。因而在研究伊始, 有必要对其源流及其本质含义作简要分析, 以期为后续的文本研究提供更加丰富可靠的支撑。

一、西方和谐理论辨源

和谐理念在西方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和谐思想的形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时期, 带有很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由于年代久远, 该学派的和谐思想只能从后人的转述中了解。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约公元前 580—前 500) 认为, 万物的始基是“一元”, 从“一元”产生出“二元”, “二元”是从属于“一元”的不定的质料, “一元”则

是原因。从完满的“一元”与不定的“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目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平面；从平面产生出立体；从立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物体，乃至万事万物。^[2]宇宙的万物看似杂乱无章，其运动其实是按照数的排列有序进行的，毕达哥拉斯称呼宇宙为“kosmos”，意思就是“秩序”（order）。宇宙的秩序性就是“和谐”（harmony），从而整个世界的整体是和谐有序的。和谐是诸多要素的统一性或不同要素的一致性，它能够把不同的使之是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决定事物和谐与否的是他们的规律性和有序性。因而，毕达哥拉斯的和谐是一种数目的和谐，比例的和谐。毕达哥拉斯将这种和谐思想深化到德行和音乐艺术领域，认为和谐的音乐本质上就是和谐的数的比例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净化灵魂的重要作用。好的音乐可以净化有罪的灵魂，使之获得自由和解脱。^[3]与毕达哥拉斯学派争鸣的同时期的另外一个学派，伊奥尼亚学派，则提出了与其不同的和谐理论。该学派的和谐理论具有浓重的朴素唯物主义色彩。该学派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44—前483）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万物都从火中产生，也都消灭并复归于火。当火熄灭时，宇宙间的万物就形成了。^[4]因而，虽然世界表面上看是杂乱无章的，但是世界的万事万物有着共同的本质和内在的统一性。在此基础上，赫拉克利特形成了重要的“和谐”理论。赫氏认为，和谐是一个统一的世界的基本特征，在形式上表现为一致性，但在这个和谐的世界里，充满了对立，生与死、老与少、雌与雄等等种各样的对立无处不在，但对立与和谐并不矛盾，相反，正是对立和不同的事物才能产生最美的和谐，例如，没有高音和低音就没有和谐的旋律，没有竖线和弯弓的对立，就没有竖琴优美的声音。赫拉克利特的和谐的始基是能动的、转换的。世界的转化有一个一定的次序和一个确定的周期。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在我们身上，生与死，梦与醒，少与老，都始终是同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再变化，又成为后者。^[5]赫拉克利特的和谐是运动中的对立与统一。

毕达哥拉斯与赫拉克利特的和谐分别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为根基，从批判的角度分析了世界的本源，发展了人类对和谐理念的认识，开创了西方和谐理念的两大派系。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是专门探讨美的本质的第一个哲学家，在和谐问题上，他的立场坚持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唯心主义和谐论，认为人世间的和谐源于神，“和谐是为缪斯所赐”，神通过赏赐给人类音乐，纠正灵魂内在运动中产生的无序状态，从而进入和谐一致的境界。柏拉图并根据自己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发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论，从给和谐以数的解释深化到朴素的辩证法的解释。在《会饮》篇中，认为音乐是研究和谐与节奏的科学，把高低、强弱、长短、稳定与不稳定等相异相反的声音协调统一起来就产生音乐，音乐就是和谐。^[6]中世纪欧洲的哲学思想受到神学的强烈控制，和谐理念也不例外。普遍的观点是“美是上帝的另一个名字”，上帝是和谐的集中体现。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这一时期的学者普遍认为，和谐是美的理念。上帝是统一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多样的，世界为了达到上帝的统一，便在多样化之中寻求统一的和谐。因而中世纪的和谐观具有鲜明的宗教特质，无论是诗歌、音乐还是建筑方面，所强调的和谐需要庄严、稳重、平静，比例需要匀称、适度。^[7]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在和谐理念上逐渐走出宗教的樊篱，寻求人性的诉求。因而这一时期的和谐观念是与中世纪的和谐观念相对立的，从对上帝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关注。鲍姆加滕（A. G. Baumgarten, 1714—1762）认为，美是感官认识到的完善，完善的就美，不完美的就是丑，这里完善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和谐，这种和谐上的认识只有人才具有，强调了人的理性，反对了神学和谐的来源。^[8]康德（Kant, 1724—1804）在此基础上，对和谐的理念进行了扬弃，把和谐提炼为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但在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地

和谐统一中，康德认为统一的基础是主观的，具有主观的合目的性，因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和谐。^[9]步入十九世纪，黑格尔（Hegel, 1770—1831）的和谐理念在康德的基础上，强调客观感性形象，而不再强调主观上的表现，强调理性与思维，而不再强调情感表现和体验，因而黑格尔的和谐属于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10]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提出“美是生活”的思想，强调了和谐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这是对和谐理论的重大发展，将和谐的探讨从纯粹的理性深入到现实生活，将和谐的理念提升到唯物主义的高度。然而他的唯物主义和谐论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11]依据马克思的美学观点，和谐的本质源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本质，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的和谐统一，这是人类在和谐理论发展史的思想结晶。^[12]

二、中国和谐理论辨源

和谐理念在中国也有着漫长的发展渊源。和谐思想的形成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是中国历史的开端，这一时期出现的思想直接影响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这一时期，各种思想萌动，百家争鸣。基本上奠定中国文化中和谐理念品格的应该是春秋战国，也就是东周时代。道家文化奠基人老子（约公元前 580—前？）提出了“道”生万物的思想，认为整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从“道”那里派生出来的。万物始基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万物皆为虚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在老子看来，“无”是道的本体，“有”是道的作用，“道”没有形状，没有声音，没有实体，并且永恒不变，是万事万物形成前的统一状态。因而“道”是天地的根，万物的宗。^[13]然而，“道”虽生长万物，却是无目的、无意识的，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即不把万物据为己有，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主宰和支配万物，而是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发展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让万物顺其自然而无为，从而构成整个世界的和谐秩序，这种和谐秩序强调的是依照自然规律无为而治的自然法则，反映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实现“小国寡民”的理想。这是道家的和谐观。与老子同一时期的儒家文化奠基人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则对和谐观更多的赋予了经世致用的功能。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和“礼”的观点，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主张用仁治和礼治来教化人民。针对当时出现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的社会现象，要求约束自己的行为，而符合礼的规范，即“克己复礼”，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秩序的周礼。为了实现这样和谐的社会秩序，最好的方法就是中庸的方法。宋代程颐对中庸理解“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较为符合孔子中庸的思想。^[14]这也就是说，实现和谐社会秩序的中庸之道就是不走极端和稳定不变。因此“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对待任何事情都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盲目附和，但需要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即主张“取和去同”的哲学观念。但君子的和要符合道义的原则，以周礼作为指导，“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第一）。以“仁、礼”为思想基础，以中庸之道为实现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儒家的和谐观。

道家和儒家的和谐观讲求不同的处世法则，道家强调遁世无为以求和谐，而儒家强调经世致用以求和谐，建立了中国和谐理念的两大门派。这两种和谐理念此长彼消，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奠定了中国和谐理念的基础精神。

汉代初期，民生凋敝，统治者为了维护有效的统治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强调社会的和谐稳定，采取了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来发展生产。到了汉武帝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逐渐弃黄老而重儒学，崇奉“温柔敦厚”的“诗教”，要求严格遵守“礼义”界限，不能触及统治者的地位和妨害封建秩序的稳固。因而，汉代的和谐思想除具有明显的政治作用外，往往儒道并杂，此消彼长，兼具儒道两家的特征。汉初陆贾（约公元前240—前170）为构建一个秩序井然、长治久安的王朝，为统治者提出了一整套以儒家“仁义”为主，以道家“无为”为最高理想的治国方针，在陆贾的心中，仁义是定危拯乱的方法，“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新语·道基），施行仁义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但经过仁义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应该是悠然清静，无为而无不为，无治而无不治的。^[15]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为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目的，提出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和谐论。认为人是仿效天的形象而产生，人是天的副本，人与天同类，因此，人类社会的治乱与天道运行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应恪守严格的君臣父子夫妇的伦常关系，施行仁政，统一思想，才能实现符合天道的和谐社会。^[16]这一观点构建了封建社会正统的和谐观。南北朝时期，社会处于战乱和分裂的时代，佛教盛行，和谐理念被蒙上一层宗教上的外衣。认为世界虚空，生死轮回，需要行善积德，广积善缘，以求来生的幸福。慧远（334—416）提出因果报应的和谐思想，认为人的神是不灭的，一个人今世或下世的贫富贵贱是由他自身前世或今世为善作恶的结果，这种和谐观对于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具有积极的影响。^[17]隋唐五代时期，儒学复兴，儒释道三家并存，为中国三教合流的时期，三教思想相互斗争并相互交融。这一时期，儒家忠孝仁爱思想在社会居于官方统治地位，道教和佛教则以其独有的出世和报应轮回与儒家思想相得益彰，共同构筑了融合儒释道三者思想的和谐精神。刘禹锡（772—842）认为，佛教有助于教化，能起到“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死生之际”，有“阴助教化”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刘禹锡同时还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和谐思想，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特性的意义把握人与自然的区别和对立，认为人可以有意识的“胜天”，自觉的改变无意识的世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关注到了人的能动性。^[18]宋元时期，禅宗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理学得到成熟和完善。和谐思想完全克服了前期儒释道三家相互斗争的局面，逐渐以儒学为骨干，融摄佛道两家的智慧，形成了外儒内佛、二者互补的理学思想。这种以理学为特征的和谐思想在朱熹的理论中得到了完全的阐释。朱熹（1130—1200）的核心理念就是继承和发展了理一元论，认为理是创造世界万物的根本，是第一性的，气是创造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理是永远不变的，因而由理而派生的社会秩序也会“君臣父子，定位不易”，由此而构成封建社会和谐的等级秩序。在个人修养上，强调“格物穷理”，通过“格物”，达到对内心的认识，从而了然天地万物之理，进而人们各安其位，尽伦尽职。^[19]明清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向了末路，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兴起，朴素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逐渐反映在和谐论里，这一时期的和谐批判了宋元时期的理学的先验思想，进而构建了以实学为特征的和谐思想。王夫之（1619—1692）是这一时期和谐思想的集大成者，认为气是世界的唯一的实体，而理是气的内在规律，是依附于气的，即“气者理之依”的和谐观念，这种观念将宋元唯心论的理学和谐观发展为唯物论的实学和谐观。^[20]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民主思想得到传播，因而这一时期的和谐思想得到新的升华。严复在接受西方达尔文的思想后，提出了以进化论为特征的和谐观。按照严复的观点，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化，落后就要被淘汰，只有通过“自强保种”“与天争胜”才能实现图存发展。^[21]

三、中西方和谐理论的对话及意义

中西方和谐理论在各自不同的源流之下，走着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然而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有必要对两种发展道路下的和谐理念进行多元的对话。中西方和谐理念的对话，应建立在两者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力求尊重各自差异。中西方文化传统不同，在对和谐的理解上有着各自不同的优势和缺点，因而不能用西方的和谐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和谐观念，也不能用中国的和谐标准来衡量西方的和谐理念。在这样的对话原则基础之上，可以更加深入的观照中西方和谐理念不同发展之路，以及在不同道路上所拥有的同质与异质的含义。

1. 和谐理论发生根源的对话

任何一种理论的发生都不是空穴来风的，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和谐理论也是如此。古希腊在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所处时代之前就已经有了高度的文明，居民已经定居并主要靠农耕为生，奴隶制城邦已经构建，这一点和中国的老子和孔子之前的时代很相似，当时中国处于商周时期，虽有短时的战争，和平占据了主流。在这种较为稳定但偶有动乱的环境下，使人们对于和谐有了一定的精神诉求，处于上层社会的哲人们有时间去考虑和谐，于是和谐的产生有了最根本的经济社会基础。

和谐理念的发生，还与当时社会的神话传统不可分离。神话发端于原始时代的宗教观念，是当时人类精神世界的集中表达。就中西方的神话传统而言，是有所不同的。古希腊神话早在荷马时代就已形成，最大特点是神是人的典型和提高，是拥有特定神通的超人，与人类世界相同，神的世界有君主宙斯，王后赫拉，武官有战神阿瑞斯和智慧女神雅典娜，文官有太阳神阿波罗和大地女神得墨忒耳等等，诸神各有其位，各司其职，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神话体系。中国社会当时的情形略有不同，神的世界有伏羲、女娲、后羿、黄帝等等，中国的神往往是历史上某个时期某个人物的事迹的神化，较为分散，与现实社会距离较近。在这样精神传统的大背景之下，古希腊和谐思想的构建侧重于抽象与系统，是一种形而上的探讨，而中国则侧重于和谐思想与社会的联系较为密切，仅仅是出世与入世的区别。古希腊的神具有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尔虞我诈，正义与邪恶并存，而中国的神则往往是正义的化身，事迹充满了正能量，正义往往战胜邪恶。因而西方的和谐发生强调自然的运行，较少涉及人性道德领域的诉求，而中国的和谐发生更多的强调善性的成长，关注良好社会规范的形成。

2. 发生的和谐理论的对话

就发生的和谐理念而言，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以数为基础的和谐理念和中国道家老子以道为基础的和谐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提出了和谐的世界秩序是由类似于“一、二、三”等数字衍化派生而成，但在数字本源的解释上略有差异，毕氏认为世界源于一元，由一元而生万物，而老子则认为世界源于一种虚无的“道”，由道再生“一”，从而构成缤纷的世界。这样细微差异的产生结果是，毕氏的数侧重客观自然万物，主张用逻辑的思维来理解世界的本源，而老子的道则侧重主观内心世界，认为世界归结于无，主张用消极的态度看待世界。将两种世界观扩大，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这也预示着中西方在未来的和谐理念乃至其他方面的走向必然是不同的。与道家交相辉映的另外一个门派——儒家的孔子构建和谐的秩序则展现出积极的人生态度，要求用积极入世，用仁政和礼教来修身治国。在具体方法上，孔子崇尚《易经》的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物极必反等阴阳五行规律，和以这些规律为基础

形成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的中庸精神特征。而与此相应的是，西方赫拉克利特则在和谐观上表现出与儒家的阴阳五行相似的学说。赫氏在地水风火四大要素作为世界本源的基础上，提出火是最基本的，自然事物都是由地到水到风到火（上升）和由火到风到水到地（下降）的不断转变过程。^[2]赫氏与儒家不同的是，儒家五行相生相克，不分厚重，有着中庸的精神，再被赋予了仁、义、礼、智、信之五义后，更表达了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而赫氏的和谐观则在四大要素的基础上提出火的中心地位，将世界的本源归结为永恒的物质——火，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前进发展的观点。因此，相对于儒家的和谐观，赫氏的和谐观多了一分批判的含义，强调只有在否定中发展才能实现和谐的存在。作为一种起源，这就奠定西方后来的和谐理论是对前期的和谐理论的继承与批判。而儒家孔子的和谐观则多了一分稳定的特质，强调和谐是维持系统的稳定和互相制衡，作为一种起源，奠定了中国后来的和谐理论是对前期理论的继承和拓展。

和谐理论自发生以来，在中西方依据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西方自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已降，各个时期的和谐论均围绕唯物与唯心的角度展开批判式的发展，具有抽象的形而上的特征。而中国自老子和孔子已降，各个时期均将和谐考虑为经世济用的利器，具有具体的形而下的特征。在这样两种轨迹之下，中西方的和谐理论在发展中是否有相似之处呢？不难发现，西方的和谐理论在古希腊、中世纪、近现代等一系列时期的发展中，发展轨迹逐渐由纯理性的解读转为上帝的统一，再发展为对人的关注，和社会活动的指导。也就是说西方的和谐论发展到近代，逐渐的考虑到了和谐的社会功用，在这一点上，和中国的和谐论走在了一条路上，中国和谐论从诞生之日起，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在关注着和谐的社会作用。而中国的和谐观则在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和近现代的发展中，侧重点由符合天道的自然运行转向人的社会作用与内心修养，再发展为对理和气的本源的探讨。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和谐观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逐渐走到了唯物主义的道路，在这一点上，也与西方的和谐含义有着惊人的一致。

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思想也逐渐渗透到西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使中西方和谐理念发生了巨大的碰撞，激发起灿烂的火花，两种不同的和谐理念逐渐拥有了更多的同质因素，逐渐融为一炉，这一理念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展现出崭新的美感，成为观察世界和分析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现在，和谐理论作为一种完善的美学思想体系，不仅仅可以构建起规范的理论框架，同时还有着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或者直接可以说，和谐论就是建立在方法论基础上的美学体系。因此，和谐论可以凭借其自身开放而辩证的美学精神引领人类走向更加崇高的境界。

参考文献

- [1] 郑玄注、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李学勤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78页。
- [2] [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著：《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4、16页。
- [3] [5] 朱立元：《西方美学思想史（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5、81页。
- [6] [7] [8] [9] [10] [11] [12] 周来祥：《论美是和谐》，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6、77页。

—79、80、90—96、105、106、119—120 页。

[13] 张明, 于井尧: 《中国哲学史》,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 第 21—22 页。

[14] 曾参、子思: 《大学·中庸》,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3 年, 第 89 页。

[15] [16] [17] [18] [19] [20] [21]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著: 《中国哲学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第 143、151、225、302、353、467、563 页。

[22]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 第 34 页。

China's and Western Harmony Theory Source and Their Dialogue

Gao Weihua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Shenya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Shenyang /Liaoning Province, 110142)

Abstract :Harmony idea possesses great domain and strength of utterance in China's and Western cultural landscape. Harmony thought in the Wes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two schools ---Pythagoras and Heraclitus---which are different in Idealism and Materialism, and in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to two sects --- Lao tzu of Taoism and Confucius of Confucianism---which are different in Retreat and Engagement. Go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ancient Greece, the middle ages,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nd the modern era, western harmony theory on the basis of the unceasing criticism gets rid of the stale and brings forth the innovative idea. China's harmony theory,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e-Qin period, Han and Tang dynasties,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nd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ursues a unique way of development. The two clear development contexts make possible multiple and equal dialogue between China's and Western harmony theories. The occurrence of the harmony theory in China and the West is that both have similar economic and social basis and spiritual traditions, i.e., the myth. However, the occurring harmony theories in China and the West on the basis of similariti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t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at make harmony theory in China and the West develop in a different way, and it is similarity that makes harmony theory in China and the West eventually merging possible. In modern times, China's and western cultures exchange unceasingly, which gives a new connotation of the harmony idea, and the harmony idea becomes a powerful methodology tool and aesthetic concept of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of the world shared by China and the West.

Keywords: China and the West harmony theory idealism and Materialism Retreat and Engagement dialogue